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陈祥勤 著

马克思与政治哲学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陈祥勤 著

马克思与政治哲学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与政治哲学问题/陈祥勤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7-208-15379-0

I. ①马… II. ①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1378 号

责任编辑 熊捷 董洪波

马克思与政治哲学问题

陈祥勤 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5
字数 296,000
版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379-0/A·132
定价 75.00 元

本书的基本主题，就是探寻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最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对社会这一人类的自然界及其自然史规律的发现。那么，马克思的这一贡献在政治哲学上意味着什么？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如果马克思有政治哲学，那么，这一政治哲学又有着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旨趣？等等，这些都是本书力图解答的问题。

对此，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分析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信纲和基本问题；中篇是展现马克思的思想在左翼政治哲学中的奠基性地位；下篇是探寻马克思的思想对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传承性关联。

该书的另一项意图就是试图探寻政治自身所秉承的理性，或者说政治理性。历史上任何一项政治性的知识、创制和技艺，背后都蕴含着实践性的政治理性，都蕴含着解决特定的历史、社会问题的创造性的实践智慧。

作者简介

陈祥勤，1972年3月生，安徽岳西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国外社会主义和其他左翼思潮研究，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和经济社会思潮等领域有较深的学术积累，近年来开始转向当代中国历史、道路和制度研究。出版《马克思与历史普遍问题》（独著）、《解放神学》（合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纲》（合著）、《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合著）、《国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与现实》（合著）等学术专著。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多篇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或部分转载。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承担上海市哲社规划一般项目共3项。

马克思与政治哲学问题



自序

一般来说,马克思所开创的思想传统是属于现代性范畴,而且是属于现代性思潮之左翼传统。我们知道,“左翼”的哲学和政治经验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经验,这一经验植根于现代人对于历史之历史性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之中,在这一信仰之中,人们是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汲取生命、智慧和力量源泉。所以,不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他们基本都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及其所开创的传统一般都是以批判性和革命性为标识的,属于现代世界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等左翼运动。至于马克思的思想与古典思想之间很可能存在的深层关联,在左翼语境中是不太探寻的。

因此,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想探究马克思(及其所开创的传统)与西方古典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例如,我先前写的《马克思与普遍历史问题》就是在对历史的思辨哲学和批判哲学的批判性反思中,试图探寻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维柯的历史哲学之间的理论关联,并将其放置于更为恢宏的古典语境中,发掘马克思—维柯的历史科学所具有的古典智慧。而几年前完成的这份书稿则是探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及其所属的现代左翼传统与西方古典哲学和政治思想之间的传承性关联。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最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对人类的自然界即社会的发现。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马克思开辟了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三块新大陆”,即“历史科学的新大陆”。自此之后,人类历史便进入了科学与理性的视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贡献在政治哲学上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史地位?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到底又有是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旨趣?等

等。关于这些问题的回应显然是见仁见智的。

政治或政治性,通常是作为“为人之理(ethos)”而被思考的,而且究其实证性的形式来说,政治也只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种与“自然之理(physis)”相区分的“为政之理(nomos)”。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要感谢马克思对历史科学这一新大陆的发现。因为正是通过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以及这一科学所秉承的自然史观,我们才第一次将社会(societas),从而将政治(polis)作为真正的(尽管是属人的)自然范畴而不是单纯的历史、人文或伦理范畴加以探讨,因而为政治的真正对象即社会,也为政治本身,找到了属于它自身的独立性的自然起源、自然根基和植根于自然的存在理由,这就是社会这一人类自身的自然界和自然史。

该书从结构安排上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是分析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信纲和存在问题;第二板块是揭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在左翼政治哲学中的奠基性地位;第三板块是探寻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对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传承性关联。这一结构性的安排,其主要意图在于通过对诸如右翼和左翼、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探寻马克思的思想与西方古典思想之间的深度关联,以古典思想的哲学洞见和政治智慧为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及其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该书的另一项意图,就是旨在探寻政治的 logos,或者说政治自身所秉承的理性。其实,福柯就有专文谈论这个问题。政治或人类的政治事务有着植根于它自身的智慧,孕育着属于它自身的理性,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理性(Political Reason)。这是一种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设定于其中的理性,因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理性,而不是像康德那样,是一种仅仅在 sophia 或 episteme 的意义上谈论道德的存在理由(自由)和认识理由(道德律)的抽象的实践理性。而政治这一人类最高的技艺所孕育的理性就是亚里士多德式(而不是康德式)的实践理性。历史上任何一项政治性的知识、创制和技艺,都蕴含着这种实践性的政治理性,都蕴含着解决特定的历史、社会问题的创造性的实践智慧。

所以,真正的学问对于人类的此岸世界都是有所用益的,在迂回的意

义上都是伦理学或政治学,当然在至高的意义上都是艺术。这正是古典思想对我们的教诲。

“学问辅明智,识鉴资通达”,但愿如此。是以为序!

陈祥勤

2018年8月15日

申城宅居

目 录

导言 作为启蒙反思的政治理性批判·····	1
-----------------------	---

上篇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一章 自由主义的思想起源·····	27
第一节 自然与自由:古典内涵及其现代性转换·····	27
第二节 自然法:从义务到权利·····	36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法权世界观·····	44
第二章 自由主义的基本信纲·····	57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权利原则·····	57
第二节 自由主义的两个基点·····	66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	75
第三章 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	88
第一节 自由主义对于社会或人的社会性的遮蔽·····	89
第二节 自由主义对于政治或人的政治性的遮蔽·····	97
第三节 自由主义对于道德或人的道德性的遮蔽·····	106

中篇 马克思与现代左翼政治问题

第四章 左翼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把握·····	124
第一节 左翼对于历史的基本设定·····	125

第二节	左翼对于现实的理论诊断	133
第三节	左翼对于未来的理论占有	142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与经典左翼的理论与实践	156
第一节	自由为人性与社会奠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与人类学	157
第二节	解放为历史和政治立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政治学	165
第三节	理想与现实的辩证法: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践	174
第六章	当代左翼的若干问题	186
第一节	当代左翼思想的理论技艺与困顿	187
第二节	左翼政治的理论议程:未来的辩护与拯救	196
第三节	左翼政治的实践议程:理想的正用与误用	205

下篇 马克思与古典政治哲学问题

第七章	自然概念与人类的自然界	223
第一节	古典自然概念和现代自然概念	224
第二节	自由对于自然的形而上学救赎	233
第三节	社会:人类自身的自然界	241
第八章	正义理念与历史的自然法	254
第一节	正义理念的超验性和自然性	255
第二节	自然法:古典内涵与现代变迁	263
第三节	正义与历史的自然律或自然法	271
第九章	政治实践与社会的自然史	283
第一节	正义与法律或政治的真理性	284

第二节 政治与社会的自然史·····	292
第三节 政治实践的主旨与实质·····	300
结语 自然概念的历史和政治重建·····	312
主要参考文献·····	318

导言

作为启蒙反思的政治理性批判

——phronesis 与政治的 logos

“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则华英必得其节以秀孚矣，此官民之道也。”

——《大戴礼记·少闲》

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康德将“启蒙(Aufklärung)”把握为一个有着历史性时刻(moment)的现代性事件。从这一刻开始，人类将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1]，进入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必屈服于任何偏见或权威的时代，不仅如此，而且理性将成为人类的最优的自我统治形式，在这一统治之下，人类将真正迎来它自身的人性(Menschheit)和自由生存的状态。所以，启蒙，作为现代人反思自身所处的现在(present)的历史或思想事件^[2]，被誉为对“理性的发现”，正是这一发现内在设定了现代性历史的起源、出场和某种合目的性的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的所思、所为和所是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回溯到启蒙事件。

所以，启蒙问题始终与理性问题相关，与如何发现和正确运用理性的技艺相关，因而与以下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相关，诸如：何谓理性？理性的可能和有效的使用范围是什么？或者说保证我们正当地运用理性的前提或条件是什么？理性及其自由运用是否有着某种形式的理论或历史限

制？理性的此类限制、限度或界限对人类的存在、历史和命运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权能或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分析、批判和澄清。惟有如此，人类才能祛除对理性的不正当运用所导致的权威或偏见的统治，以及理性的异化和他律(heteronomy)，才能达到康德所说的理性的自律(autonomy)和自由。这正是康德所开启的理性批判事业的主旨和根本使命。正如他在《逻辑学讲义》中所指出的，对于人类的理性批判事业，我们必须明确以下问题：(1)人类能知道什么？(2)人类应当做什么？(3)人类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4)人是什么？^[3]因为诸如此类的问题最终都关系到人性问题，关系到人类如何真正进入人性和自由状态的生存问题，因而也是启蒙和批判事业应当分析和澄清的问题。

因此，启蒙就意味着“理性的成熟”，而批判记载了理性在启蒙中逐步成熟起来的轨迹。所谓的启蒙时代就是一个理性批判的时代。正是这一时代曾经将诸如理性、自由与进步的历史关联在一起，构成了现代人的根深蒂固的历史信仰，同时，它也激活了某种典型的现代性态度，即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恒久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启蒙时代所开启的理性的批判和自由运用的历史并没有带来“自由理性与理性专制之约(the contract of rational despotism with free reason)”——即对理性的自由自主的公开运用将是人类社会服从它自身的统治的最优选项——反而陷入了诸如理性与自由之间、理性的技术异化或抽象性统治与理性批判对自由和人性的渴望之间等一系列二律背反。启蒙本来是要开启人类属于它自身的自由和人性状态的文明史，没承想却召唤出了理性以资本、权力和知识等技术形式宰制人类自身的新的蒙昧史或野蛮史。所以，尽管18—19世纪的思想家确立了理性与自由或人性在哲学意义上的同一性，但是“理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理性的名义下“自然与控制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4]仍然是困扰现代人生存的基本问题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所开启的理性批判事业并没有结束，因为还有很多有关理性的问题——或者为启蒙所遗忘，或者为其所遮蔽——有待

于进一步澄清。

如果我们将启蒙还是视为对“理性的发现”的话,那么,这一发现就不能仅是哲学的,即在纯粹哲学的反思中给出理性的形而上学图像,整个世界可以将这一图像视为自身的理性辩护的基础;也不能仅是历史的,即在历史或社会批判中揭示理性的(如技术、资本、知识和权力等形式)物性化图像,以及人性和自由在这一图像中的异化、扭曲和自我丧失。毋宁说这一发现还应当是伦理的或政治的,即在理性批判的名义下,我们不仅应当认识人类各项理论事务和现实事务的本性,而且还要发现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事务的成熟的理性态度,以及这一态度所需要的实践性的智慧(phronesis)或美德。显然,这种理性不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或者说不再是哲学的,而是政治的,它的主题不再是彼岸的形而上学对象,而是此岸的人类城邦及其各项事务,它不再孕育着某种理论性的天真或癫狂,而是呼唤着某种实践性的审慎或明智。这种理性,我们就可以将其恰当地称之为——其实也是古典的哲学和政治所蕴含的——“政治理性(Political Reason)”^[5]。

“政治理性批判”,正如福柯在《关于政治理性的批判》一文中所说的,这一题目“听上去有些自命不凡”,而且轻易捡起这一庞大的话题显得“极不恰当”,但这一题目“自命不凡的原因正是它自命不凡的借口”,因为“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一直不遗余力地批判政治结构中理性的作用或理性的匮乏”。^[6]理性的政治批判或政治的理性批判,不论是作为理性在历史、社会或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或作用的分析,还是作为人类在处理各项事务中所呈现的理性品格的揭示,始终是启蒙以来现代思想所关心的核心议程之一。

在这篇文献中,福柯指出,理性批判的作用不仅在于防止“理性越出经验给定物的界限”,而且也在于对“理性的过度权力保持警觉”。因此,所谓的“政治理性批判”,就是旨在揭示“贯穿于西方社会历史的政治理性

(political rationality)的自我扩张和自我强化”过程,并在对“政治理性之真正根基”的分析中探寻自由和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福柯的政治理性批判显然是秉承了现代性启蒙所固有的思维习惯,或基于人性、自由和解放等理想,对于理性——作为社会或人的灵魂的自我控制或自我统辖的技术——的社会、政治和伦理作用始终抱有一种本能的警惕。这一警惕心理,我们在现代思想对于启蒙理性的哲学、政治和社会批判中不难发现。

其中,最为著名的例证莫过于韦伯对于世界的祛魅(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进程即理性化进程的毫无隐晦的展示。韦伯终其一生的思想主旨就是向世人呈现现代西方文明在经济、社会、政治、法、伦理乃至宗教等各个领域逐渐形成的理性化的形态和运行机制的历程,揭示这一历程本身所蕴含的诸如知性与理性之间、事实与价值之间、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或分裂。文明的理性化进程及其所展现的矛盾和分裂一方面催生了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现世秩序,另一方面却又催生了“实质上非理性”的生活方式,催生了人们的现世态度的知性化;这种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矛盾揭示了现代人生存的两难处境,它贯穿于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并统摄着整个生活世界。韦伯所揭示的文明的理性化进程,以及它的内在矛盾、分裂和问题,不仅给现代西方文明带来了所谓“社会的风险性”及其“操作控制”等系统性问题,而且带来了更为根本的“意义”问题。对此,韦伯说道:“我们已经被完全卷入了这样一种(理性化的——引者补)进化过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怎样促进和加速这一过程,而是设法反抗这个机器,免于灵魂被分割标价出售,摆脱这种至高无上控制一切的生活方式,以保持人类中的一部分自由。”^[7]

可以说,韦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理性化和技术化进程的批判(此外,当然还有19世纪的马克思对资本法则之抽象性统治的批判)代表了现代性启蒙所揭示的理性在技术、资本、权力和知识的异化下所遭受的基本的历史待遇,同时也开启了理性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批判——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法兰克福式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先河。诸如此类的理性批判理论,一般是试图在其思想进程中恢复理性的某种形式的辩证图像,恢复

理性与自由或人性之间的某种或隐或显的辩证关联^[8]，以此揭示、批判和对抗理性的实证化、技术化和操作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对于现代人的社会、历史和命运的统治、宰制乃至劫持^[9]，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启出某种形式的或隐或显的解放、回归或救赎之路^[10]。在诸如此类的理性批判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理性与人性或自由之间已经失去了启蒙时代所设定的想当然的原初同一性，或者这种同一性已经丧失了现实性的实证基础，或者已经遭到现代文明经验的证伪。一方面，理性无可避免地异化为敌视自由和人性的知性化或抽象性的（技术、资本和权力和知识等）统治秩序；另一方面，自由被悬置为无法为这一客观性秩序所还原或简约的主体性的剩余物，并寄托着日趋微弱的甚至是行将消逝的人性理想。

其实，诸如此类的韦伯式的理性批判既是对理性的历史或社会批判，同时也是对理性的政治批判，只是福柯在这篇文献中试图揭示西方的统治或治理技术的理性化进程，而韦伯终其一生旨在揭示现代西方文明在各个社会领域所形成的理性化的技术或运作机制的进程。

倘若我们仔细检视一下韦伯式的理性批判和福柯式的理性批判，尽管他们之间有着历史与政治、社会及其自我辖制技术等诸多层次的差异或区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这就是：在诸如此类的对于理性的历史、社会、政治批判中，理性总是习惯于以某种确定性的实证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这一形式中，理性或者是某种确定性的知识、或者是某种确定性的技术，或者是某种确定性的秩序、体系或实证结构。尽管启蒙思想自诩为对理性的发现，但这种发现在本质上是直观的、抽象的或理论性的，当它将理性确证为某种形式的知识、技术或实证结构的时候，就已经遮蔽了理性的植根于伦理、政治和法的生活的某种实践性的智慧或美德形式。显然，理性的确定性的实证形象与现代启蒙对于理性的知识、技术或科学设定有着本质性的关联，即理性一般被把握为确定性的知识(espteme)或技术(techne)，而不是与社会、政治或伦理生活有着源初性关联的实践性的智慧(phronesis)。启蒙理性总是习惯性地人类处理它自身的社会、政治和伦理事务所展现的实践性的智慧、美德或技艺视为实证性的对象或单纯的历史事实，视为一个社会得以完成它自